

2 2 2

劉洪波

瓦·巴卡京著，非琴譯：《擺脫克格勃——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回憶錄》（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1998）。

早在70年代，索爾仁尼琴（Aleksandr I. Solzhenitsyn）的《古拉格群島》（*The Gulag Archipelago*）已經向世界展示了以克格勃為首的蘇維埃「懲罰之劍」的內幕。而今，輪到克格勃自己的人馬出來述說真相了，巴卡京——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回憶自己的經歷，書名卻叫做《擺脫克格勃》。短短二 年時間，克格勃從最勇敢的人都不能挑戰的神聖，變成了連它的主席都要擺脫的魔鬼。

索爾仁尼琴通過大量的個案調查，勾畫出將普通公民從正常社會流向古拉格的那條「暗道」。巴卡京走得更遠，通過少量關鍵性的「核心事實」，從內部攻破了克格勃賴以生存的理由。索爾仁尼琴的筆墨，一直追溯到蘇維埃革命初期捷爾任斯基的「契卡」；巴卡京不僅如此，更為克格勃及其前身的行為邏輯給出一個名詞：契卡主義。契卡主義的實質，就是「根據一個臆造出來的方便公式，經常不斷地尋找敵人」，其思想體系不是與法律，而是與現實意識形態完全融合在一起。契卡主義「把恐怖與不法行為提高到國策的高度」。

契卡主義之所以能夠有效地作用於所有公民，不僅僅是因為契卡機構手段無微不至、作風神秘恐怖，還因為它得到整個意識形態的幫助。許多人為情報機構工作，負責地監視他們的同事、鄰居、朋友，真誠地認為這乃是為祖國盡著神聖的義務。教師們日復一日地讓學生牢記敵人無處不在，敵人必須被消滅；新聞工作者則言不由衷地歌頌著層出不窮的成就，根本不理會社會制度的缺點。任何一個普通人，要麼照領袖或「人民」指示的那樣，「像大家一樣」生活，要麼就是「人民的敵人」，應該進入不存在狀態。薩哈羅夫曾指出，在這種氣氛下，「社會沾染上了這樣一些風氣：冷漠、偽善、市儈的利己主義、毫不掩飾的殘酷無情。社會最上層的大多數代表人物——黨和國家的管理機關，一帆風順的最上層知識份子的大多數代表——頑固地抓住自己或明或暗的特權，對違反人權、進步、安全、人類的未來利益漠不關心」。

被契卡機構控制的，不僅是普通公民。隨著契卡機構日益成長壯大，它像一切官僚機構一樣，成了自身利益的維護者。蘇聯制度給予契卡機構無所不在的特權，契卡機構則負責為這個制度提供合口味的服務。契卡機構壟斷了國家領導人賴以作出決策的情報，社會信息通過契卡機構的過濾，才能流向制度最高層的人物。在這種情報的傳遞中，契卡機構使整個國家的決策打上了自己的印記。克格勃主席根據個人傾向，決定哪些信息應該提供給領導人，克里姆林宮事實上被克格勃洗腦，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克格勃的玩偶。

一個制度之所以會採用特務政治，往往是由於以為這種政治最能消滅潛在的威脅，從而最大

限度地保證權力的安全。然而，事實的發展往往正好相反。在中國，明朝的特務政治成為削弱王朝最經常也最強大的體制。在蘇聯，契卡機構同樣起到了這種作用。斯大林利用契卡機構製造大規模恐怖的同時，也使貝利亞產生取而代之的異想，斯大林之死的詳細過程仿如燭影斧聲。在直接導致蘇聯解體的1991年「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」政變中，克格勃充當了衝鋒隊。克格勃根據「法定權力」切斷了戈爾巴喬夫與外界的通訊，並對他實施軟禁，它的主席克留奇科夫不僅參加緊急狀態委員會，而且事實上是政變的策劃者和主要操作者，克格勃武裝力量「阿爾法」特別分隊則是政變者倚靠的重要力量。名為「國家安全委員會」的特務機構，終於被證明為對國家安全最具威脅的力量。

失敗的政變改變了歷史，契卡機構摧毀了自己存在的最後一點理由。隨著蘇聯的解體，作為一種制度的克格勃終於在前蘇聯地區消失。如今，無論該地區的那些國家實行著怎樣的制度，那裡的人民至少免受國家機構夜半敲門之驚。然而，契卡主義作為一種「樹立敵人」、「將敵人消滅於萌芽狀態」、從而走向壓制人的自由意志的思想體系，並不會輕易從這世界上消亡。

「主義」比制度更加頑固。契卡機構最大的罪惡，就在於它產出了一種叫做「契卡主義」的怪胎。在這種「主義」之下，「社會的每個成員都互相監視，而且有義務告密。每一個人都屬於大家，大家也屬於每一個人。就所處的奴隸地位來說，所有奴隸都是平等的」。人們對契卡主義厭惡到如此程度，以至於契卡機構的首腦竟然都對它啐口水，這恐怕也是那些不斷為它添磚加瓦的人們所沒有想到的吧。人類公理得到昭彰的過程或者真的緩慢，但也不是遙遙無期。歷史真是殘酷已極。